

文史资料选辑

1980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八〇年第六辑

(总第三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责任编辑 王有为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文史资料选辑

1980年第六辑(总第三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4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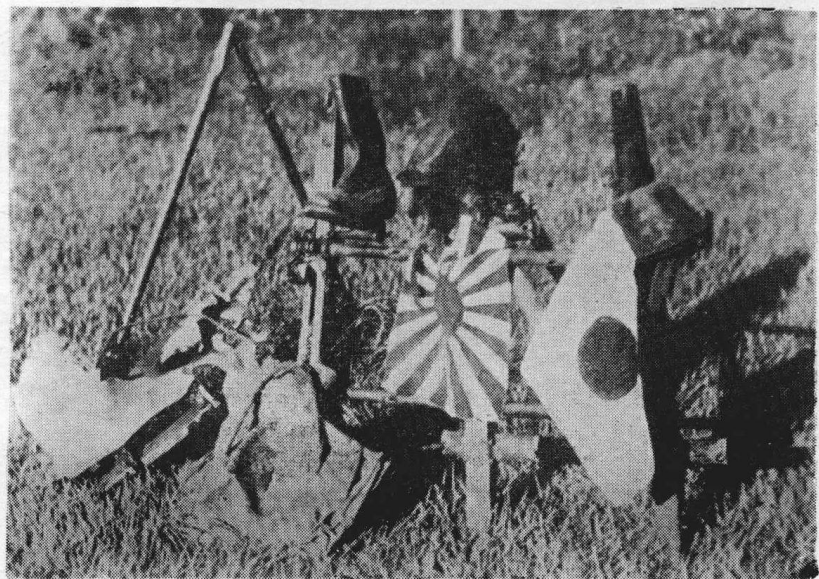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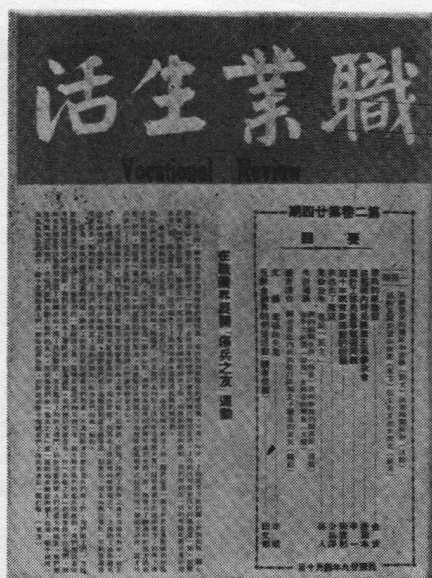
书号 11074·388 定价(六) 0.69元

内部发行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军炮轰上海闸北



抗日战争中我军缴获的战利品



《职业生活》周刊

新四軍密佈兩路

以民衆慰勞品分贈難民

僞江蘇省政府恐慌萬分

（本報特訊）據常州來談：本月二日新四軍曾派三四百人經蘇州光福至常錫間之戚墅堰，在常州城東十六里）當經過時，紀律甚佳，服裝亦頗整齊。當地居民見國軍復至，紛紛以豬羊相贈，該軍堅不接受，後因民衆代表堅決要其接受，該軍乃將豬羊煮熟分贈難民。因該軍聲稱彼等已有國家供養

，不能再擾老百姓；但對老百姓此種盛意，極表感激。當地僞公安局長及催租委員，均曾被捕，經一番勸說及警告後，即釋放，謂下次再遇見，如仍做漢奸，將予制裁。蘇州僞省府聞訊，極感恐慌。

據廿日英文大美晚報載：項英統率之新編第四軍，現已配備完竣，準備在揚子江下游東戰場中大舉活動。據悉：已擊隊之主力現已分佈於鐵路沿線各城市之近郊及村莊中，京滬線之丹陽，形勢甚爲緊張。日軍因恐游擊隊截擊，竟緊閉城門不出。丹陽南之金壇，亦遭游擊隊活動之威脅。又訊：滬杭線上松江楓涇間之某地，本月十八日新四軍部隊與該處日軍發生衝突，激戰達兩小時，華軍在日軍後援趕到前，即安全撤退。又嘉興松江間之某軌，一部分亦被華軍游擊隊破壞，列車開出被迫停止四小時。

抗战期间新四军在苏南活动的报导

日商銀行

華員注意

滬戰以來，前在日商銀行服務華員，因不甘事敵而退出者甚衆，現上海銀錢業聯誼會，目下正在舉行日商銀行退職華員登記，並負責介紹工作，登記處在霞飛路五四二弄五號該會。

上海銀聯進行日商銀行退職華員登記的通告

目 录

怀念王若飞同志·····	黄逸峰 (1)
迎接上海解放的一项准备工作·····	陆象贤 (7)
关于毛岸英毛岸青出国经费的来源·····	董寿琪 (17)
抗战时期的片断回忆(二)·····	梁国斌遗著 (19)
记《职业生活》周刊·····	张承宗 (38)
《职业生活》纪要·····	谢胥浦 (42)
上海银联十三年·····	银联史料编写组 (56)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许文庆 (85)
我所知道的于右任·····	周伯敏遗著 (91)
从旧桂系到新桂系·····	章元凤 (111)
记科学时代社·····	胡永畅 (138)
刘海粟与人体模特儿写生·····	商一仁 (149)
关于马相伯创办震旦大学及其他·····	马玉章 (158)
关于徐步和徐卜夫·····	许德良 (165)
关勒铭金笔厂史料 ·····	宁思宏口述、徐正元整理 (169)
抗战八年大事记(初稿)下·····	本刊编辑部 (179)
《文史资料选辑》一九八〇年第一辑至第六辑总目录·····	(205)

怀念王若飞同志

黄 逸 峰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我在南京被反动派逮捕。同年十月间，国民党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南京局面混乱，得以保释出狱。当时我党设在南京北门桥的交通机关还安然保存，我即积极恢复地委工作。不久，江苏省委派吴某到南京接替我的地委书记职务，我向他介绍了南京党组织的情况，交代了工作，即回上海向省委报到。

省委接待我的是王若飞同志。当时他任省委农委书记，年龄比我大，但还不到三十岁，身体结实，个儿不大，精神饱满，讲一口爽朗的贵州话，笑嘻嘻地对人，使我一看就感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领导人。

他一见到我就热情地拉手，问我什么时候到上海的，并说：“你这次吃苦了，好好休息一下。”我向他汇报了南京工作的情况和被捕与出狱的经过。他说：“你在狱中的表现很好，我们已从其他出狱的同志了解到全部情况。”接着他问我准备担任什么工作，我说：“大革命后我已被捕两次，在工作中深深感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都很不够，希望能有个学习的机会。”他笑着问：“你愿意去莫斯科学习吗？”我表示愿意，他说：“好，我向省委提出，批准后通知你，你先作好准备。”这是我第一次和王若飞同志会面。

不久，省委通知我准备参加最近即将派遣的一批人出国，并指定我为率领这批出国人员的主席团成员之一。记得参加过一次主席团会议，到会的有赵世炎同志的爱人夏之栩，还有夏曦同志的爱人，姓名记不得了。出国工作正在准备中，若飞同志又找我谈话，说情况发生变化，省委组织部有位科长因车祸受伤，省委决定由我接替他的工作，征求我的意见，并说：“在工作中学习锻炼也一样，不一定要出国。”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第二天，若飞同志亲自带我到八仙桥青年会的一间住房门口，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没人钉梢，他开了门锁，带我进去。这是一所布置雅洁的房间。他告诉我：“这是省委组织部办公的地方，你就住在这里，除出去吃饭以外不要离开。橱子里都是文件和档案，要保管好，查阅要登记。这房间除我以外，任何人不能来。这里有许多书，你可自由阅读，但不能带出去。”接着他把钥匙交给我，我就按照他的嘱咐，担任了一星期这样的工作。我一向爱动，现在象鸟儿被关在笼子里一样，除了看书就是睡觉，实在闷得慌。

有一天，若飞同志来了，问我怎么样？我没开口，他已看出我不耐心做这样的工作，接着说：“是不是过不惯？我们也考虑到你不太适宜做这项工作，已另外物色了人，你以后到农委当秘书，明天我带另一同志来接替你。”这样，我就到了省委农委。和我同时当秘书的有何孟雄和一个姓华的同志，我分工负责接待外地来的同志，并要我单独建立一个交通处，地点在泥城桥附近的一个过街楼上，门口挂一个商业公司的招牌，我每天在那儿办公，经常见到李富春和陈乔年同志。

四·一二事变在江苏各地刮起了反共反人民恶浪，农民协会在北伐军到来时争得的胜利果实，都被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抢夺回

去，还受到种种新的压迫和剥削。因此，革命的怒火在各地燃烧，武装起来打倒蒋介石的运动在江苏各地全面展开。这年冬季，青浦县开始酝酿武装暴动。当时我党青浦县委书记是夏采晞同志，组织部长是陈云同志，武装工作部长是吴志希同志（初中学生，年仅十七岁，很勇敢）。若飞同志指定我帮助青浦工作，我曾几次到青浦的小蒸、练塘一带参加会议。

这年十二月，若飞同志找我谈话，谈的是领导“打狗队”的事。当时江苏各地爆发农民暴动，许多地主分子携带财物逃避到上海，当地党组织要求江苏省委予以打击。本来江苏省委在四·一二事变后，已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秘密收藏起来的枪支收集起来，挑选了一批参加过起义的英勇战士，约二十人左右，组成一支锄奸自卫的武装力量，队长姓王，副队长是江文浩。这时省委应各地要求，决定采取行动，若飞同志要我兼任这个队的政治指导员，并指示：“这个队的成员尽管都是党员，但是掌握了武装，很可能出乱子，你的任务是做好队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具体行动计划，由王、江两人负责，你们商量好了，一定要经过审批才能采取行动。”

记得第一次行动是打击江阴的一个大地主。江阴暴动后，这个大地主逃亡来上海，江阴县委派人尾追，把他的居住地点、活动情况调查清楚，告知我们。我们集中了少数人拟订行动计划，报请若飞同志审批，他慎重考虑了我们的计划，作了些修改，要我们按照执行，并指定王队长负责指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事先做好准备，根据内线侦察，时间选在某天下午二时，地点在南京路河南路抛球场。接连几天，我们都化装分散在南京路几个大旅馆所包的房间内，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要求大家机动灵活，绝对

保密,并将人员分成四个组,第一组负责侦察,第二组负责执行,第三组掩护撤退,第四组在执行后张贴布告。这天我们按照计划胜利完成了任务,处决了那个大地主,并在法租界他家中抄出全部财物,上交省委。我们在上海闹区采取这样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特别是张贴的宣布地主死刑的布告,给租界当局以很大的威胁,老百姓纷纷赞扬“共产党真是神出鬼没”。以后我们又进行了几次这样的行动,“打狗队”在上海出了名,给阶级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这年冬季,青浦暴动爆发,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地理上距交通线较近,加之我们经验不足,暴动很快被镇压,指挥员吴志希同志被俘。若飞同志十分关心,积极设法营救。他了解到敌军中一个姓云的营长是他舅舅黄齐生先生的学生,黄先生住在法租界西门路,若飞同志想和他联系,又怕暴露自己的身分,不利于保密。有天,他和我谈起,要我化名“王如飞”去见黄齐生,请他写信保释吴志希同志。我按地址找到黄老先生,当他听我说叫王如飞后,表示惊讶,问我“认识王若飞吗?”我说,“知道他的名字,但不认识。”他盯了我几下,问有什么事找他,我即提出要求他写信给云某,保释吴志希。他似乎会心地一笑,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了解了”,立即写了信交给我,并说:“你如遇到王若飞,请告诉他,我很好,要他安心工作。”我辞出后,立即向若飞同志汇报,他说:“舅舅是了解我的。”可惜这封信赶送到松江时,吴志希同志已英勇就义,未能发挥作用。

一九二八年二月,若飞同志建议江苏省委派我到南通去,组织南通特委,由我任书记,并派彭汉章同志任特委军委书记。当时苏北各地党组织正发动农民暴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地主阶

级的反攻倒算，泰兴、如皋等县委要求省委批准他们的行动计划，并派人去指导工作，我和彭汉章同志就是省委派去的第一批干部。

出发前，我参加了省委扩大会议，听了邓中夏同志的形势报告和若飞同志关于江苏农民运动及部分地区准备武装起义的报告。临行，若飞同志和我个别谈话，讲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和战略战术问题，指出反流寇主义的重要性，要我们把工作扎根在农民群众之中，做好苏维埃建设工作，在南通等城市还要做好工农配合的工作。这年春节期间，我和彭汉章同志各带手枪一支，到了南通，首先传达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了解各地准备武装起义情况，不急于组织特委。我先后到了如皋、泰县、泰兴、东台等地，在泰兴习家网呆了较长时间，帮助进行动员和编组赤卫队工作。泰兴县委书记沈毅同志要求在他们发动起义后，如皋、泰县、东台都能响应，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因此我即去东台动员。由于内部有人告密，我和东台的一部分同志被捕。没有料到，我离沪前与若飞同志的谈话竟是最后的一次会晤。

我在狱中听说，我被捕后，若飞同志曾亲到苏北，检查和布置工作，泰兴、如皋的五一武装起义，就是他直接指挥的。后来又听说，这年六、七月间他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由于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他以党中央前任秘书长的身份作了自我批评，接受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胸怀坦荡，毫无怨言。回国后，他仍在江苏省委工作。一九四六年，协助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不幸于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牺牲。那时我在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原想多年阔别后能有机会再见到敬爱的若飞同志，结果只能在充满悲壮气氛的追悼会上看到他的遗像，使我痛悼不已。

若飞同志为党殉职三十四年了。当年我在他领导下工作，还是精力充沛的青年，如今年老多病，精力衰退，但他的音容笑貌和英勇机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想起他，总是激励着我的斗志，要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迎接上海解放的一项准备工作

陆 象 贤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我从上海撤退到香港。过了一个多星期，组织上安排在上海地下党干部学习班学习。参加这期学习班的有徐周良（曾任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已去世）、许炳庚、王克顺（现为上海市总工会常委、生产部长）、陆忠义（曾任上海求新造船厂副厂长）、何馥麟和我，一共六人。学习班有四个工作人员，程振魁（曾任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和他的爱人陈英管财务，还有邓裕民和一位管生活的广东阿婶。

这个学习班是秘密的，成员间彼此都不讲自己的工作情况。日常到这个学习班来走动的同志极少，只有与上级联系的沈涵，来为我们治病的吴涤苍（曾任中共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现为顾问）和送来过龙虾给我们打牙祭的马小弟（曾任上海总工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在西安含冤去世）。我们主要是反复学习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接管济南、石家庄等城市的经验。当时，我们越学越高兴，认识到在一九四九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上海快要解放，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将在全国获得胜利，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就要出现。我们也讨论了如何迎接上海解放，但谁也不知道自己在迎接上海解放中究竟将承担什么样的

任务，都等待着组织上安排，每个人的心里又兴奋又焦急。

二月中旬，沈涵到学习班来通知我，今晚有一个领导同志要同我谈话。晚上，沈涵陪我乘公共汽车到了一个车站接头。我见到一个从未见过的中年人，他一见我就说：“你就是列车，是大陈（即陈公琪）的好朋友。”“列车”是我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常用的笔名，我一听到这两句话，就明白了他就是了解我的底细的领导同志。我和沈涵跟他到附近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坐下，这间房很狭窄，三个人坐下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这位领导人就是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他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要在尽快的时间里收集上海的经济资料，作接管上海的准备。我听了后，有点犹豫，心想我在大学虽学过一点经济学，也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出版过一本《新中国经济地理教程》，这次从上海到香港，随身还带了一本书，是联合国救济总署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统计资料（到香港后就交给组织）。看起来，我知道一些经济方面的事，可是我从未想到过要直接参加准备接管上海的经济资料，不知道从何着手。我把这点顾虑和困难对刘晓同志直说了。刘晓同志说：组织上考虑过这些情况，但是仍然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我说，既然如此，我一定去努力完成。刘晓同志就交给我一张由许涤新同志签名的信，介绍我到九龙千家驹经济研究所看资料，并且授权我在香港尽量购买有关上海经济和其它资料。从第二天起，我就每天在香港和九龙之间来回，为收集资料紧张地活动了十天左右。

千家驹经济研究所收藏的上海经济资料很丰富，给我的帮助很大。我每天上下午都去看资料，为了节省费用，中午回学习班吃饭。当时九龙和香港之间有两个摆渡口，一个是渡汽车的，一个是渡汽车、也渡人的，来往的人大部分在一个渡人的码头上汇集，容

易碰到熟人。当时国民党也有不少人派在香港，所以我的活动有一定的风险。曾经发生过两次情况，都被我设法躲避过去，这一段工作总算是顺利的。我在千家驹经济研究所一边看资料，一边心想地下党要积累资料真困难，一九三九年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工人委员会出版过一本《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曾对一些重要产业作过调查，积累了一些资料，可是以后由于环境险恶，没有可能继续下去。我看到香港积累和整理的上海资料，在上海就看不到。因此，热烈地盼望上海早日解放，迅速地建立起各种研究所。

我正在九龙和香港忙着收集上海经济资料和关于上海的其他资料时，突然接到通知，将资料装箱，准备出发。我和程振魁、陈英是学习班中第一批出发到解放区的，其他同志还在待命。过了两天，我们在晚间分批乘小划船登上一艘货船，刘晓同志最后上船，他一到就启航了。我们一行六个人，是刘晓、程振魁、陈英、吴涤苍（准备出席在北平召开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王伟业（出席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我。在船上，刘晓同志对我们说：“大家都是贩货的商人，货船过台湾海峡和上海长江口时可能遇到敌舰搜查，都要有所准备。”我上船后，观察了这艘货船载重量只有几百吨，挂英国旗，有无线电设备，船长和大副是英国人，管电台的是个德国人，船员大多数是马来西亚人，有一个华人。

船在游动，我环顾四周，港湾内十分寂静，海面上漆黑一片，远望香港的灯火绚烂，这是我到香港一个多月来第一次见到它的夜景。可是这时我已没有欣赏夜景的闲情逸致，在我眼帘里和思想上展现的是朝气蓬勃的解放区的景象和解放军向江南进军的壮丽画卷，巴不得货船飞快地到达山东烟台港口。

天有不测风云，我们的货船在台湾海峡遇到了风暴，船离开海